

的长时段的研究。

第五，应致力于资料的发掘利用。与江南相比，近代华北集市（镇）研究的瓶颈之一，便是资料尤其是方志资料相对不足（如镇志、乡志等较为少见），因此，更应重视档案资料、报刊资料、口述史料、调查资料和碑刻的发掘利用。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国内的“乡村建设派和日本的“满铁”等机构大量的调查资料。

## 民国年间冀中农村教育研究

侯建新

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

教育，特别是农村教育至今仍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，也是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。本文主要根据陈翰笙等老一辈学者的第一手调查资料，回顾与分析民国时期特别三四十年代冀中乃至华北地区的教育状况，从历史的角度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。

人口与教育是密切相关的问题。先简要说明人口的变迁。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大致状况是这样的：清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人口剧增时期。明代人口只有六千万上下，清代康熙以来人口大幅度增长，1700年人口首次达1亿左右，18世纪突破3亿，19世纪已达4亿。自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上半叶，中国人口时有浮动，但在总量上变化不大。本文所研究的民国时期即20世纪上半叶人口即属于这种情况。

从陈翰笙先生1930年的调查记载以及河北省统计局对40年代的追踪调查记载看，基本符合上述总的概况。从1930—1946年十六年间，清苑的人口增长不快，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缓慢的，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7—9.5%之间。

冀中同国内大部分地区一样，民国初年到30年代，很多村庄仍未设立小学，私塾仍然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。1932年，保定地区“全境四五百村，而未设立学校之村庄，竟达十分之三四，女小尤寥若晨星”。即使设立小学的村庄，往往同时也保留私塾。在整个华北地区，私塾教育在农村都有很大的市场。根据1935年的一项统计，冀鲁豫三省共有351个县，平均每县有私塾48所，塾师48人，学生735人。考虑到当时很低的入学率，显然这还是一个不小的比例。

在冀中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，教会学校往往成为现代小学的先导。

在教育方面对村民有普遍影响的事情，还是村办学堂的兴起，它们是现代小学的前身。村办学堂，一般都是在私塾的基础上，以庙宇改造为学堂，被老百姓戏称为“中华民国大改良，以大庙改学堂”。

当时清苑的县城在保定，保定也是直隶的省府所在地，又临近京城，固此得兴办新学的风气之先。清苑的劝学所于1906年成立，这是袁世凯办学机构的县一级称谓（1923年改称教育局）。劝学所设总董一人，下有劝学员六人，分赴各乡镇，督促建立小学堂。1908年时，全县的初级小学已达150余处，并把这些小学划为五个学区，每学区又设高等小学一处。初等小学学制4年，高等小学3年，初小4年是义务教育。现代小学开始普及时，缺乏师资是主要问题之一。为提高现有教师水平，劝学所组织初等小学老师和私塾塾师，分期分批来县城参加讲习班，进行培训；最后，为长远计，1923年正式创办清苑师范学校（1931年改称县立乡村师范学校），为新兴的乡村小学提供师资。师范生多数来自农村，毕业后又回到农村，担任高小和一部分初小教师。该师范学校先后为清苑培养了数百名乡村小学教师，是当年全县的教育中心。

笔者颇感兴趣的发现了一张教师花名册，这是该师范学校教职员1938年的登记名单，从中可对该校的师资构成、课程设置以及教职员工的报酬等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考虑到该校当年师范生每月2元钱的伙食费以及当地一般村民的消费水平，应当说清苑教师的这份待遇还是不低的。

到1932年，除在保定设县立师范学校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外，还在乡村的共建12所高等小学校，两个班，学制改为二年。多数是走读生，住宿生仅占10%，学生年龄参差不齐，年龄较高者达20岁。教师由县统一分配，教学经费、教师薪金，一律由县拨款。学生除书费、伙食费外，全年还交2—4元学费。

与此同时，初级小学也发展到 214 所，其中包括女子小学 8 所，私立小学 2 所。当时清苑辖 400 余村，大约 2 个村便可有一所初级小学，可见，就初小设置的密度看，基本可以满足村民就近入学的要求。初小开设的课程是国文、算术、常识、修身、公民，写字和珠算也是必修课；高小的课程除初小课程外，又增设了历史、地理、自然等课程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个别高小竟然还开设英语课。后来高小和一部分初小又增设了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课。由于教学内容多样、实用，气氛活跃，教学秩序也有所改善，所以私塾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向新式小学转移，从而私塾和教会办学逐渐被淘汰。显然，到 30 年代晚期，现代初等教育已在全县占据主导地位。

清苑除一所县立师范学校外，没有普通中学，只有少数村庄高小附设过初中班。清苑沦陷后，大部分学校停课，教育被严重破坏。抗战胜利后才有所恢复，至 1949 年，全县有初小和高小均有一定规模的发展。

以上可以看到，20 世纪上半叶清苑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，特别是新式小学教育取代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私塾教育，并使面向普通大众的初等教育体系在农村大地上的初步确立，这无疑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变化。它对当时的国民教育的影响是相当缓慢的，不过还是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教育对民众人口素质的影响要有一个过程，而且它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条件的辅助，至少需要安定的和平环境等，而当时中国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，尤其是残酷的八年日本侵华战争，肯定损害和延缓了这样的过程。

生产者普遍受教育的程度，是农村人口素质最重要的标志。

11 村调查资料表明，就普通的生产者来讲，清苑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，绝大部分人仍然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的愚昧状态。1930 年所调查的农村人口中，文盲的比例接近 90%；1936 年和 1946 年两个时点的文盲数额有所下降，可是很有限，始终未能改变文盲构成农村人口主体这一基本状况。农民家庭中几代人没有一人识字的现象，一点儿都不罕见。受教育的人口，不仅数量小，而且层次低，大部分是小学水平，而小学水平中又以初小程度占绝大多数，也就是说，农村中的非文盲部分主要是指那些读了 1—4 年书的人，将近占人口总数的 10%；读到高小的村民仅占 3% 左右；读到初中者，二百人中有一位，是村中绝对的“秀才”；而读到高中者，一千人中有一位；读到大学的村民子弟，更是凤毛麟角，平均一万个人中有 2 人，许多时候其实是零。

与清苑相邻的定县，情况也差不多。李景汉先生 1928 年起便对河北省定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，根据他的统计，1930 年前后，在 7 岁及 7 岁以上的人口中，文盲占 83%，女子的识字率尤其低得可怜，仅占 1.7%。另据津南农村生产建设实验场学员的调查，沧县白家口村“村民蔑视教育”，“全村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十”，可见河北省乃至华北地区农村的教育情况大致相似。

统计资料还表明，受教育的程度与家庭的经济富裕程度几乎完全成正比。比如在清苑统计资料的三个时点上（1930 年、1936 年、1946 年），少数高中以上学历者全部出于中农家庭以上，其中富农以上的家庭又占主体。贫农及其贫农以下的家庭一般最好的教育程度是高小，只有极个别人（1%）上到初中。这些数据证明，贫穷是农民接受教育的最大障碍；而政府又没有什么作为。

由于贫穷，多数学龄孩子不能入学。一是家里吃饭问题都没解决，没有经济力量供子女上学。其实当时上学没有多少投入，小学不收学费，基本文化用品的花销有限，即使按低标准的消费水平讲也是很有限的，可是许多农民仍然无力提供。二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，家庭要尽量和尽早缩小非劳动人口的比重，所以，孩子很小就参加劳动，如打草、拾柴、喂家畜等，成为维持家庭生产和生活运转的不可或缺的小劳动力。这样，清苑 7—13 岁的学龄儿童中，只有三成左右的少数孩子在学。

学龄儿童失学成为文盲的策源地。另据调查，1935 年，河北省境内 97 个县失学儿童比例为 60.94%。1936 年河北沧县白家口村个案调查，也认定失学儿童占 60% 以上。据河南有关方面的统计，沁阳等地区的“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百分之三十九，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百分之六十一”，可见，百分之六十左右儿童失学率在华北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另一方面，从清苑的统计资料中还可看到，在学儿童的比例在缓慢地增长，16 年间提高了 12.83%，考虑到其间战争连绵不断，应该承认乡村的教育水平还是有所发展。